

殖民旅行研究

Colonial travel studies

跨域旅行书写的文化政治

张文瑜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殖民旅行研究

跨域旅行书写的文化政治

Colonial travel studies

张文瑜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殖民旅行研究：跨域旅行书写的文化政治/张文瑜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 12

ISBN 978 - 7 - 5668 - 1855 - 3

I. ①殖… II. ①张… III. ①游记—文学研究—西方—国家—近代
IV. ①I1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3755 号

殖民旅行研究：跨域旅行书写的文化政治

ZHIMIN LUXING YANJIU: KUAYU LUXING SHUXIE DE WENHUA ZHENGZHI

著 者：张文瑜

出 版 人：徐义雄

责任编辑：曹 军

责任校对：黄志波

责任印制：汤慧君 周一丹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 张：18.125

字 数：299 千

版 次：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2 月第 1 次

定 价：46.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言

西方早期最著名的旅行家无疑当属奥德赛，对之海上漂游，最后返乡经历的精彩描绘，也使荷马的这部传说被奉为西方文学最伟大的经典之一。“奥德赛”也被视为西方精神之“魂”的一部分，是可以从许多方面加以阐述的，而其颠荡的游历不仅赋予了这一形象超越狭隘空间与日常平庸的浪漫气息，更是确证了一种英雄式的人格征兆，由此而为后人迷恋不已。

15 世纪末之后，随着大航路的开辟，无数的西方人再次怀揣奥德赛情愫，从不同的港口扬帆出征，踏上了前往异域的旅程。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现代性的展开也是与跨域旅行的步伐相接踵的。当然，现代奥德赛与作为原型的奥德赛在许多方面仍是有所区别的，比如从最初进入中国的利玛窦等一批人来看，便可发现前后两代人在装备与精神秉持上的一些差异。后来者也兼具前辈的人生“智巧”，以借此迎接陌生甚至险恶环境的挑战，却已经更多地为现代知识所充备，并以一种“文明人”的姿态出现在所往之域；到异地去远行对他们来说，虽然也同样意味着身体的冒险与灵魂的磨砺，但是在后来者那里会更多地包含一种“征服”的欲望，这与更大背景上的一套思想体系，尤其是帝国殖民主义工程与目标是密切相关的。进入 19 世纪后，随着西方殖民步伐的加快，其足迹几乎遍及地球上的每一片空旷之地。正是借着这种持续不息的跨域活动，西方人不仅建构出一种以自我/他者来界分的、愈益清晰的现代性主体，而且发展出了各种与异域相关的现代知识体系，比如人类学、地理学、博物学、东方学、比较语言学等。在另一个层面上，为了吸引其国内读者对域外世界的想象性消费，也涌现出大批描绘远方异国的旅行记、小说与新闻报道等，并培育了现代欧洲人的一种带有特殊情调的阅读习惯。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在西方人的心目中，这些不断累积的有关异域的书写，虽然形态各异，但无论是学科性的，还是文学性的，都具有无可置

疑的、在前提上的正当性，甚至于在素材上也相信其是基于事实的（至少是“想象的真实”）。而这些观念的确立又大致出于以下缘由：首先是基于一种群体性共认的原则，即“无意识中的自我言说正确性”，这包括殖民时代已被普遍信奉的文明论等，因此而将各种相关的叙述视为某种“自然而然”的效应。其次，在诸如人类学、地理学、博物学等文本中，由于表述的方式是被“科学”的名义担保下来的，它们不仅建立在一套严密的学科规则之上，而且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能掌握，为此也很难从外部加以破解（尽管有少数学者也曾尝试性地对之加以解码）。最后，就是在书写与阅读之间形成的一种天然“距离的帷幕”，从一开始即将阅读者隔离开来，受者在没有亲历场景的情况下，很难辨别书写的可信度，其中也会掺杂一般阅读中常会出现的对作者人格化的某种预设性的信任。

但是这一为“英雄感”所涂染的历史，在后殖民主义、话语理论、文化研究兴起之后，则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从大的方面来看，这始于后理论对“常识”的考辨，由此而将所有历史的正当性均划入了有待质询的范畴。进而是身份理论的出现，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行动者、书写者“身份位置”的彻底检审，使得我们无法再以视而不见的方式“抹除”在身份角色中所包含的差异性权力的要素，并意识到不同的身份言说是以差别/权力递降的方式来完成其记叙性活动的。与此同时，对“观念结构”的分析也愈趋深入，单个书写者的人格特征，始被置于一种总体的政治与文化语境中来加以考察，即认为个体不仅会受到某一文化象征系统的提前预示，而且在其与语境的动态性交换中，也同样会形成一种相对一致的共识性的结构，并以集体想象的方式贯穿于对异域世界经验的描述中，为此，在后来的反身性分析中，我们也可以识别出人格化背后的那种具有更大规模的非人格化要素。无论叙述者是“无辜”的，还是带有清醒意识的，其实都无法摆脱这种不可自主的力量对之的塑形。时至今日，我想这些学术上的背景已经为我们所谙悉了，也正是基于这种理论上的突破，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了对整个西方殖民历史及其话语模式的诘难，与之相随，与殖民运动纤毫无法分离的跨域旅行书写，也被纳入到了各分支学科的反思中，“旅行”，在这一时期中成为出现频率甚高的学术性概念之一。如果我们将这一研究视为后殖民研究的一个延伸模块，那么毫无疑问，“旅行”的视角也将获得独特的意义，即其可以从更为具体的知识生

产的来源、路线与可触摸的空间上进入殖民文化版图构建的腹地。

文瑜在新疆生活三十余年，数年之前，怀着对新理论的渴望，来京随我学习文化研究。在几个层次的课程中，我们先是以时间为坐标，系统地梳理文化研究演变的轨迹，这大致需要花费一个学期的时光。然后在后续的一年中，我们会将该领域内的各类话题分为十几个类型或板块，并下系多部原著，通过一段时期的研读、汇报、交流与思想上的碰撞，便大致可深入地，也是比较全面地建立起对这一系统的一个总体性的认知框架。其中，也会穿插一些国际交流的实践，以便能近距离地与英美文化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们接触。在此基础上，再让其按照自己的兴趣或旨趣择定今后的研究方向。记得当初在确定论文的题目时，文瑜已经有了两个选项，一是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探索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进入西北地区的欧洲探险家、旅行家的书写活动以及边域想象；二是从学术史的层面上，对当代西方世界有关殖民旅行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并尝试获取一些新的阐释。这两个选题固然是有密切关联的，但从程序上看，考虑到如果能够对各种理论资源有一先期的把握，则将会对随后的具体研究有所裨益，加之，也是鉴于文瑜在英语训练上的优势，因此我还是建议她先从后一选题入手，在功成之后再徐图前一课题的研究。

文瑜的论文很顺利地通过了答辩，并得到了专家们一致的高度评价。如先不计诸多的细部，仅从大的格局上来看，我感到这篇论文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可以在此一述。首先，论文提出了“殖民旅行研究”这一概念。尽管此前的西方各路学者所从事的研究都已经纷纷指向了这一含义，但作为一种概念，则还是隐形地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中，更不用说是对之的系统化演述了。既然如此，通过对既有研究的较为完整的梳理，并同时将这一概念提升为一个可用于操作，及反观多种同类研究的核心命题，则可借此将散布于不同学科、文本中的论述集聚在一个总体性的叙述法则中，整合或构建出一个更大的理论话域，这当然是具有独到建树，并具重要价值的一项工作。

其次，是将各种与殖民旅行相关的文本，以“书写”的概念来关照与统合之，以此而可抹平不同文类之间固然存在的那些消极性隔阂。我们知道，诸如人类学、地理学、博物学等的撰述，在之前不单是处在各自为政状态的，而且由于均冠以“学科”的名义，故而一般都会将之视为一种

“研究”；而游记、纪行等文类则因其多靠近于“文学”，因此而又多称之为“创作”，这些不仅表现在对原文本的界定上，也相应地会呈现在对之所做的反思性研究中，由此也造成了在各撰述文类之间存在着一些几乎是难以逾越的鸿沟，很难将之置于同一个层面上予以考察。然而，如果我们用“书写”（writing）的视角去厘定之，那么就可以暂时悬置这些先定性的界限。虽然我们最终还是无法取消已有的文类界别，或将这些“形式化的根源”置之度外，以至于在具体的研究中还是需要虑及历史的坚执性，然而，当我们将不同的文类统摄在“书写”的名义之下时，则可突破表面既有的分界，在更深处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某种纠合及共同的叙述逻辑，或者是话语逻辑。毕竟，在一项新的研究中，“科学性”与“文学性”等已不再是至高关注的要素，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类如何在一种相近的话语策略的支配下，来表达各自的多样化特征。相应地，将书写概念引入的另一个效应，也正如我在之前一些论述中所强调的，可以大幅度地超越文本主义的限制，将视野扩展至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诸多环节中。

虽然这部著述的特点或贡献绝不仅限于以上所述，但序言仍然还是以简明为好，以免提前过多地干预读者对原著的阅读与判断。既然著作已成，一旦付诸出版就不再处于作者的掌控之下，那么得失也只能交付于“流水”。与此同时，无论是秉烛夜游也好，挑灯细看也好，也一样地皆已化为过往的烟云。因此，我们所更期待于文瑜的还是在下一个路口她将会以怎样的方式登场，并再次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意外惊喜。

黄卓越

2016年夏于京城西北隅

目 录

CONTENTS

序 言 / 1

第一章 绪 论 / 1

第一节 旅行的反思与殖民旅行研究的兴起 / 2

第二节 殖民旅行研究的流变与几大模块 / 15

第三节 意义、概念与本书框架 / 29

第二章 殖民旅行研究的缘起 / 41

第一节 后殖民文化理论与殖民旅行研究 / 41

第二节 萨义德与殖民旅行研究的开启 / 54

第三章 旅行范式下民族志书写的表征政治 / 72

第一节 作为旅行的民族志：观念与修辞 / 74

第二节 文化即旅行：作为空间实践的民族志 / 100

第三节 民族志知识生产：从游记到科学民族志 / 115

第四章 差异性同构：游记中的帝国话语 / 135

第一节 程式化的相遇与食人族话语 / 139

第二节 女性游记与帝国话语 / 154

第三节 当代西方游记的帝国怀旧与全球视野 / 174

第五章 书写景观：想象地理与旅行知识空间的建构 / 199

第一节 想象、帝国欲望与景观的流动性 / 202

第二节 从“想象地理”到殖民空间：景观的改写与铭写 / 214

第三节 表征的空间性与地理知识的形构策略 / 225

第四节 旅行空间的建构：旅行的物与书写博览会、博物馆 / 238

第六章 结 语 / 256

参考文献 / 262

后 记 / 282

第一章 绪 论

旅行，作为一种人类空间移动的活动，古已有之，且人类许多重要的文化主题都与之有关。但作为一种观念，旅行无疑是伴随着现代性而来，同时又参与到西方的现代性事业之中。而旅行，作为学术范畴，则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并在一开始就被纳入批判性反思的范畴之中：美国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W. Said，又译成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中，首次将西方关于东方的旅行书写看作是话语和政治性知识，并指出旅行书写对他者的表征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运作，从而开启了旅行的反思之门。在他之后，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和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学者开始基于后殖民的言说语境，采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自身学科与旅行、旅行书写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层反思、分析与研究，旅行的概念也随之发生了具有颠覆意义的变化。旅行成为一个问题式，关于旅行的研究急速扩散，但各个学科的诠释又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殖民旅行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不仅打通了旅行书写原有的文体分类限制，将旅行作为各学科研究共享的议题，而且在增添文化政治的维度之后，改变了过去对文本研究只偏向于美学、生存和主体等角度的状况。与之同时，随着全球化时代跨域旅行的日益频繁，不同的旅行方式也愈益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考察其与传统殖民旅行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在新的流动语境中出现的变化，也已成为旅行研究中的重要部分。有基于此，需要设置一专门化的课题，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殖民旅行话题，以及包含其中的理论倾向做一系统与深入的观察、梳理与研究。

总体来看，要清楚地认识殖民旅行研究，我们有必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首先，通过历史回溯的方法来论述为何殖民旅行研究被纳入旅行反思的范畴之中；反思视域下的旅行，在观念上出现了怎样的转变，这种转变对旅行书写的研究又提供了怎样的视角；在此领域中，在西方学术界又引发了怎样的思考。其次，随着后殖民文化理论的跨学科多元发展，殖民旅

行研究亦呈现出跨学科性，那么殖民旅行研究大致都是在哪些领域得到关注，是如何被研究的，又取得了哪些重要的成果。下文将从这两方面对殖民旅行研究做一宏观上的勾勒。

第一节 旅行的反思与殖民旅行研究的兴起

美国人类学家凯罗尔·特瑞诺·威廉斯（C. T. Williams）曾宣称“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旅行者，奥德赛的故事”^①，虽然这一断言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真切地道出了旅行之于西方，尤其是西方文化史的重要性。欧洲现代性是由哥伦布航海以及新大陆的发现这一旅行活动所开启的，而随后的跨域旅行不仅成为西方人追求知识与财富、认识世界、拓展疆界和发现自我的途径，也是西方现代性延伸和全球化展开的主要路径。旅行，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欧洲“历史变革的主要推动力”^②。美国人类学家兼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在描述美国南方修建铁路的情形时，即将每根钢钉楔入铁轨的动作看作是在提供“文明的灵魂”^③——而其别称就是旅行，可见旅行之于西方文明的发展是何等重要。各种旅行文化现象展示了在旅行活动中和隐藏在旅行活动之后的社会文化变革的图景和范式，同时，各种旅行观念的变迁也绘制出了西方思想观念的演变，以及文明这一“灵魂”的各种延续、演化和嬗变，因此，旅行可成为探究西方现代文明发展及其与其他地区交往的一个流动性的窗口。

① CAROL TRAYNOR WILLIAMS. Travel culture: essays on what makes us go. Westport: Praeger, 1998: p. xi.

② ERIC LEED. The mind of the traveler: from Gilgamesh to global tour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p. 18.

③ ZORA NEALE HURSTON. Dust tracks on a road. New York: Arno Press and the New York Times, 1969: p. 189.

一、旅行观念的演变

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经历,旅行是“说明各种转变和变迁的隐喻”^①,在西方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和社会功能。古代和中世纪的人将旅行看作是人类命运的必然,是一种身体和精神上的受难,旅行的结束则是精神上的圆满,如奥德赛式的英雄旅行与各种朝圣旅行(pilgrimage)。此种观点强调旅行是一种考验,通过失去而获得自我认识与自我确认,旅行不是使旅行者发生新的变化,而是使其内在的、潜藏的性格品质显露出来。这种旅行常被称为“苦旅”(travel),强调旅途中身体的劳累,以及由此引起的精神或灵魂上的升华,在《圣经》中多有表现,延续至今。

自文艺复兴时代到启蒙时代,世俗文化兴起,由此而主要盛行两种世俗化旅行。一是以哥伦布地理大发现而引发的“新世界”探险旅行,各种跨域旅行丰富了欧洲对于世界与自然的认识,确立了各种学科体系,旅行与帝国疆域的扩展和殖民开始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此种旅行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一是以弗朗西斯·培根为首的英国经验主义者将旅行作为认识世界、获得真理和自我教育的途径,如培根认为,“对年轻人来说,旅行是教育的一部分;对成年人来说,是阅历的一部分”^②,因此他主张年轻人在导师的陪同下到世界各地游学,记录所见所闻。这一游学模式影响了延续近两百年的英国“大旅行”(the grand tour,又译为“壮行”,时间为1660—1840年),使英国上流社会的年轻人能够到世界各地旅行,而英国的绅士教育也主要通过这种有组织的、有基本固定旅行地的“大旅行”得以完成。“大旅行”对英国的影响超出了一般的文化意义,因为“从头至尾,大旅行都是一次意识形态训练(ideological exercise)”^③,资产阶级的

① ERIC LEED. The mind of the traveler: from Gilgamesh to global tour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p. 3.

② FRANCIS BACON. Essays. Beij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7: pp. 50 - 51.

③ JAMES BUZARD: The grand tour and after (1660 - 1840). In PETER HULME and TIM YOUNGS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ravel writ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7 - 52.

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由此得以巩固和传播。这两种世俗旅行被看作是一种推动个人和体制变化进步、转变的空间移动经历，因为在旅行中不仅可以获得关于广阔世界的知识，也可以获得关于自我的知识，这也使得旅行成为双重发现的航行（voyage）。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期，浪漫主义的兴起，标志着后启蒙时代表征空间的重新绘制：推翻了理性的控制，崇尚无限的冲动、个人表达和创造精神。这一时期的旅行热爱自然的原始性、文化差异，渴望沉浸于当地色彩，旅行不再是一种磨难、痛苦，而是一种“智性愉悦”、自由的表达和对愉悦的追求与新鲜事物的发现^①，旅行更多的是年轻的资产阶级逃离日常重复生活所进行的观光旅游。此处，笔者用“游”取代了“行”，主要是借鉴了汉学家梅绮雯对“游”与“行”这两个基本概念的分，她认为，“‘行’是目标明确且在目的地有任务或使命的行进，而‘游’则是一种平常无意图的自我决定的旅行或是漫游”^②，在浪漫主义时期，“游”更多取代了“行”。当然，这一时期也见证了欧洲对各大洲有组织的内陆探险，这一活动的规模迅速达到顶峰，出现了众多的科学探险旅行者，以至于呈现出三种旅行者——探险者（explorer）、旅行者（traveller）和观光游客（tourist）^③并行的情况。随着全球探险的展开，帝国主义也进入其黄金时期，殖民地旅行成为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叶这一时期的主导旅行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交通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旅行形式变得愈益多样化，这也导致了旅行方式与观念的多样化，世界范围内的跨域旅行更加频繁，旅行俨然成为当代人重要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的必需品。

通过以上对旅行观念史的粗略梳理，我们可以大致为旅行做出如下的定义：从广义上讲，旅行是指跨越物理空间的活动，如巡游、军事远征、外交出使、商贸旅行、游学、科学探险和朝圣等集体性的或自愿选择的空

① ERIC LEED. *The mind of the traveler: from Gilgamesh to global tour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p. 13.

② 顾彬等：《中国古典散文：从中世纪到近代到散文、游记、笔记和书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95 页。转引自苗壮：《边疆书写：清帝国时代北部边疆的表征建构》，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年，第 46 页。

③ 关于这三者的区别，可参见 PAUL FUSSELL. *Abroad: British literary travelling between the wa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37-49.

间移动；狭义上的旅行主要指个人出于某种目的，自愿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到达另一陌生的地方，然后再返回的行为。在此，笔者强调旅行的自愿性，以将之区别于游牧、早期移民或流放等空间移动。然而纵观由旅行这一行为而构成的整个旅行历史，我们发现两个基本事实：一是尽管旅行的观念随着历史语境发生了变化，但某些旅行的主要特质和观念，如之前的旅行会影响后来者，旅行对人的转变与其作为推动世界进步的力量等，依然延续至今；二是旅行的观念处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中，这种演变记录了西方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并做出回应，即整个旅行的观念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并参与了西方“文明”与社会生活演进的历史。然而，旅行在很长时间以来，被当作人类的本能活动，或是人类获得知识，完成精神转变，以达到自我形塑的重要途径，而忽视了隐含其中的，也是更为广泛与深刻的这一社会文化功能。这种忽略，在学术界表现为主要以西方旅行者为中心，并以此来考量旅行者的进步、变化和身心感受，从而也就自然忽略了旅行者与旅行地、旅行地民的相遇和互动，进而忽略了旅行所可能携入与投射的诸多社会、政治和文化面向。

二、旅行书写的演变

旅行是如此普通而又频繁的日常活动，出现在各种叙事和记录之中，在中西文化中都可以找到源远流长的旅行书写，记录和铭写着自己的故事、他人的故事，甚至故事本身就起源于旅行^①。然而旅行书写的范式也随着旅行观念的变化而变化，更受到政治、宗教、经济和其他社会人文思想的影响。在古代，各种旅行活动产生了许多和旅行相关的多种形式的文本，这些文本侧重于如实记录旅行者的旅行路线和见闻，很少谈及自身，

^① John Zilcosky 认为故事起源于旅行，他引证了瓦尔特·本雅明的一句话，“当我们去旅行时，我们就有故事可讲了”。见 JOHN ZILCOSKY. *Writing travel: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the modern journe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Incorporated, 2008: P. 1。内尔·瑞尼认为最早的旅行故事是收录在《埃及的第十二个王朝》中的故事《失事的海员》(The Shipwrecked Sailor)，描述一个海员沉船后如何在奇异岛上生存下来的旅行故事，比《奥德赛》要早一千年。见 NEIL RENNIE. *Far-Fetched facts: 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and the idea of the South Se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p. 3。

从而具有非个人化的风格，常被奉为文献记载，如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The History*）^①。在中世纪，朝圣作为一种主要的旅行模式，关于朝圣的旅行书写不再重点记录所遇到的周边事物，而是采用第一人称，关注灵魂的教育；与此同时，为方便朝圣的各种旅行指南开始出现，直到大旅行时期依然盛行。此外，“骑士追寻”这一母题的旅行文学也比较盛行，虽有文学的虚构成分，但也被作为真实的、非虚构的旅行记录而接受，这两种旅行书写对后来的旅行者及他们的旅行书写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哥伦布的四次海航和航海日志成为旅行与旅行书写的分水岭，尤其是自16世纪以来，随着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书写成为旅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种航海叙事不仅是为了意识形态目的而进行的事后记录，更成为所记载活动的组成部分”，是使得旅行得以完整的记录^②。旅行书写被称为“航行与旅行”（*voyages and travels*），包括各种与旅行相关的文本，这些文本具有不同的形式与功能：轮船的航海日志，旅行者的日记与书信，商人、间谍或外交官员的报告，探险记录，朝圣，殖民征服，行政管理，沉船叙事等，但主要是描述欧洲旅行在异域所遇到的民族、宗教或仪式、风俗和语言等，这使得旅行书写包含了现代学科建制所确定的地理书写、历史叙述、民族志与旅行文学等文类。不同身份的旅行者书写了大量的旅行文本，不仅满足了读者对未知的异域风情的好奇心和世俗情趣，也为地理学、博物学、历史和其他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一手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旅行书写是个外延广泛的范畴，所有和旅行有关而产生的文本都涵纳其中。

自18世纪到20世纪，在旅行书写逐渐盛行的同时，旅行书写的范畴也开始分化，在这种分化中，旅行书写被现代学科人为地狭义化并设定为游记。自17世纪末，欧洲开始全球地理旅行探险，在这一过程中，各种与

① 卡尔·汤普森认为希罗多德是历史学家，但也可看作是旅行作家，因为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中，对波希战争的描述汲取了大量他在地中海和黑海周边的旅行见闻，包括他对所遇到的各种文化的冗长记录。见 CARL THOMPSON. *Travel writ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 36.

② MARY FULLER. *Voyages in print: English travel to America, 1576 - 162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

旅行相关的学科建立并确立了自己的书写规范,例如:民族志书写是将自己的描述与分析限定在一个单一的社会时空而聚焦于某一社群;博物学书写侧重于旅行中所发现的各个物种的分类与描述;地理书写侧重于描述土地、自然景观与社会景观。事实上,这些描述分析都是基于旅行之上的,但被纳入学科体制后,大大弱化了旅行过程,失去了动态的叙事,成为静态的描述。换言之,这些学科的旅行记录通过去文学化的书写规范被人为地从旅行书写中分离出去,导致了旅行书写范畴狭义化为游记。与此同时,全球地理扩张激起了公众对异域的更多渴望,印刷术的发展也促成了各种旅行文本的传播,英国读者大众得以形成,以探险旅行为母题的小说大量涌现^①,随之也出现了旅行文学的说法。由于旅行记录在修辞与叙事方面与小说有着诸多相同:旅行者是主角,行程是情节,^②此外,许多文学作家为了创作而跨洲旅行,如法国小说家古斯塔夫·福楼拜(G. Flaubert)和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英国小说家杰拉德·康拉德(J. Conrad)、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 H. Lawrence)、罗伯特·史蒂文森(R. L. Stevenson)等,至此,旅行与书写、阅读密不可分,进一步刺激了旅行文学的盛行。在这种大众阅读的语境之中,旅行文本因分享了跨域经历的印象与记忆而备受读者青睐,更激发了读者对异域风情的想象与向往,“二战”后,各种旅行文本更是占据了书店的货架,成为畅销书。列维—斯特劳司(C. Levi-Strauss)曾描述过这一盛况:

描写亚马孙河流域、西藏、非洲的旅游书籍、探险记录和摄影集充斥书店,每一本都强烈地要吸引读者的注意力,结果是使读者无法评估这些书籍里面的证据是否有价值。看这类书籍的读者,其判断能力不但没有因这些著作而觉醒,反而要求多来一点这类精神食粮,然后狼吞虎咽一番。^③

① 英国文学评论家波西·亚当认为18世纪小说的出现和演变与旅行文学有着重要联系。详见PERCY G ADAMS. *Travel litera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novel*.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3, 第二章。

② INNES M KEIGHREN and CHARLES W J WITHERS. The spectacular and the sacred: narrating landscape in works of travel. *Cultural geographies*, 2012, 19 (1): pp. 11-30.

③ CLAUDE LEVI-STRAUSS. *Tristes tropiques* (1955). trans. JOHN RUSSEL. London: Hutchinson & Co., 1961: pp. 17-18.

读者对各种旅行文本，不论是真实旅行的记录或叙述（游记或是旅行书），还是虚构旅行的描写叙事（旅行小说），都充满了永无止境的欲望，旅行成为最为畅销的阅读题材。

相较于旅行的普遍性与重要性和旅行书写的盛行而言，对之的研究却一直甚为滞后，英国著名的旅行研究专家蒂姆·扬兹（Tim Youngs）甚至认为旅行书写的流行就在于它没有引起学术关注^①。我国的人类学学者彭兆荣教授认为，旅行因为是过于普遍的日常生活而被学者看作是自然之事而被忽略，以致成为“失落的主题”^②；史蒂夫·克拉克（Steve Clark）则从旅行书写本身对这一现象做出了解释，依他看来，旅行书写——作为旅行活动的载体和记录结果，长期被学术界拒之门外，一是因其通俗性而难以进入正规学术研究的视界，二是因其混杂性导致了学术研究的困难：一方面，旅行书写“过分依赖对某些恰巧发生的偶然事件的经验再现（empirical rendition）而无法符合文学标准；另一方面，大量修辞的使用又导致其无法进入人类学、社会学、地理或历史等学科”^③。尽管旅行书写具有以上所说的混杂性，长期以来，它对所见所闻的真实记录这一传统观点使得对于旅行与旅行书写的研究多局限于哲学、历史和地理的研究视域之中，旨在通过旅行文本的研究，获得哲学思想（如阅读《乌托邦》和《西大西洋》）或获得彼时被描述区域的社会面貌或异域的地理信息（如《马可波罗游记》）。旅行文本，尤其是科学探险考察报告、民族志书写和旅行见闻则是异域知识的源文本，被各种学科表面化地当作真实材料加以利用，而鲜有将旅行书写看作是文化产品，进行深度反思和考量。

三、反思旅行：殖民旅行研究的兴起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旅行才在学术批评范畴得到学者的关注，出

① TIM YOUNGS.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travel writ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7.

② 彭兆荣：《失落的主题——旅行文化作为民族志的表述范式》，《世界民族》2012年第1期，第36页。

③ STEVE CLARK. Introduction, travel writing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y in transit. London: Zen Books, 1992: p. 2.

现了对旅行的反思，旅行书写也因之成为批评对象。这一反思更多的是得益于英国文化研究引起的全球“文化转向”。所谓“文化转向”是指“文化对社会和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重大意义日益增强；文化对各种批评和知识分子话语以及学科的重整效果；文化显现为一种分析和方式的主要构成范畴，弥漫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与缝隙之中”^①。换言之，文化被提到了与社会政治、经济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且被看作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面向。文化研究的两位开拓者引领了这一文化转向：一位是理查德·霍加特，他将文化置于日常的生活层面，如吃、穿、用、行等，更将这些文化置于研究的中心^②，这不仅打破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而且将长期排除在学术研究之外的日常生活作为研究焦点，包括旅行；另一位是雷蒙·威廉斯，他将文化界定为整体的生活方式，是平常的，文化不再是绝对的价值观，而是所有社会实践的构成部分，是整个社会进程本身。此外，他认为文化并非社会的反映，而是对社会的一种阐释和理解，但如何理解、阐释与再现则与意识形态有重大关联，因为意义与惯例都是社会性建构和历史性变化的。^③正是他们对文化的重新界定和认识以及对文化的研究使得旅行这一重要的人类日常生活实践得以进入学术视野，最终在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研究中得到重新的认识，即对传统旅行观念的反思。

萨义德曾明确表明，他的思想观点深受威廉斯的“社会与文化必须要放在一起进行理解和研究”的文化观念的影响^④，而这一文化观念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在具体的社会进程或语境中去考量文化；二是文化是在不断变化的，不同时期对社会的阐释和理解是不同的，所以一切表征都是社会的、文化的，也是政治的。这种观念不仅激发了20世纪60年代“学术理论政治化”所引发的各人文社科领域的表征危机^⑤，也为萨义德的“文

① S HALL. Richard Hoggart, the use of literacy and the cultural turn. http://www.sagepub.com/upm-data/34970_CHAP_1.pdf.

② R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changing patterns in English mass culture. London: Chatto & Windus, Ltd., 1957.

③ R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 - 1950.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0.

④ E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8: p. 27.

⑤ G E MARCUS and M J FISCHER.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enti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 9.